

## 理论圆桌

主持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公民成为网民，网络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新型的网络虚拟社会形态。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外延不仅包括传统现实社会，而且包括网络社会。网络社会反映并放大着现实社会，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是纵横交错、共生共生的。新形势下，如何认识把握网络时代的社会变化？如何加强和创新网络社会治理呢？本期“理论圆桌”约请专家学者深入探讨，建言献策。

###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转变

黄少华：网络化是当今时代的大趋势。随着信息技术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国防等领域的广泛应用，网络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扮演了无所不在的角色。从普通网民的日常生活，到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基础设施，都越来越依赖互联网。网络既推动着社会的转变，又是社会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化时代社会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边界模糊。互联网引发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就是摧毁了各种传统的社会边界。在网络化时代，不仅行为的时空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不同社会阶层和团体之间、工作和生活之间的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在网络空间中，不同的社会认同之间、不同的话语逻辑之间、不同的价值信仰之间的冲突，却又因为话语权的争夺而十分尖锐。网民有可能因为某一公共事件或议题而聚集在一起，形成规模庞大、边界模糊、聚散迅速的意见群体，又随时会因为事件和议题的变化，迅速消散或重新聚合，其群体边界极度模糊和不确定，因而非常难以掌控。

2、行为不确定性加剧。身体不在场是网络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身体不在场会导致行为不确定性的加剧。当人们认为别人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更倾向于放松自己的行为，其网上行为容易变得肆无忌惮。网络环境容易激发个人的表达和表现欲望，甚至被偏激的网络情绪所感染，引发情绪的无原则宣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空间中，极有可能因为个体行为的微小差异，引发群体行为的巨大变动，导致公共事件的集聚、突变和涌现。而且爆发这种突发公共事件，其社会影响往往十分广泛，且连锁反应突出，具有明显的即时效应、蝴蝶效应和全球效应。

3、流动权力凸显。与现实社会相比，在网络空间中，不同声音、意见、话语和价值观之间的权力争夺尤为明显，不同声音、话语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制约、控制和力量对抗，形塑和建构了网络空间中的微观权力格局。与物质权力不同，以意见、话语和价值观为核心的网络权力，没有稳定的形态，在本质上是流动和变化的，这种流动权力的凸显，使社会规范、个人隐私、社会安全等的维护，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

4、社会认同碎片化。社会认同力量的明确彰显，是网络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网络化时代，全球化和互联网两股力量的交互，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张力。在网络社会中，社会认同往往呈现出一种拼贴、流动、跳跃、断裂、碎片化的状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网络空间中的边缘化社会认同，常常借助悲情、戏谑等进行情感化表达，这些感性化、情绪化认同表达，容易引发群体极化、负向认同积累等社会问题的产生。面对网络化时代社会结构的上述转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已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迫切任务。

### 以社会治理思维实现网络再平衡

何明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

# 加强和创新网络社会治理

主持人：李磊明

嘉宾：黄少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教授、博导）

何明升（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导）

史斌（市社科院社会所所长、副研究员）

郭春瑞（市社科联学会处处长）

徐艳蕊（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

治理现代化目标，要求我们重新定位网络工作的思维模式和推进逻辑，着眼于构建多元高效的中国特色网络治理体系，实现治网目标、治网方法、治网效果在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的再平衡。

1、将新媒体管理经验与社会治理思维有机结合。我国的网络治理体系要“两手抓，齐步走”。一方面，继续研究互联网的媒介属性，总结和坚持比较成熟的网络管理经验；另一方面，深入探索互联网的社会属性，着眼构建多元高效的网络治理体系。随着互联网进入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网络的“社会属性”不断增强，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相互嵌合的社会形态日渐呈现，单纯以“新媒体”思维解释网络新生事物，或是倡导通过媒体转型来适应网络发展的“媒介思维”，已不能适应互联网发展。未来的网络秩序构建需要以全新的社会治理理念为指导，将新媒体管理经验与社会治理思维有机结合，形成既可统揽全局又能各司其职的多元化网络治理格局。

2、以“伙伴”关系培养和引导非政府网络治理主体。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有较高的行政依附性，治理现代化理念需要重新定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两者不应是一种附属或对抗的关系，而应是一种温和型的伙伴关系。互联网治理有赖于多主体协同，需要建立政府部门、网络企业、网民个体、网络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多元化合作治理关系，尤其要培育“有力量的”非政府网络治理主体。

3、构建“自律—他律—互律”的网络协同治理机制。一个有效的网络治理结构，应该是政府在实行社会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与其他网络主体建立起来的相互协调和合作的关系模式。这种多元化的网络治理结构，有赖于自律、他律、互律三个机制的协同整合。其中，自律机制体现网络治理过程中各社会主体的自我管理，也是社会治理思维的核心和关键；他律机制是相对于网民自律而言的政府行为，是支撑网络治理的根本保障；互律机制体现各网络治理主体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功能，可以平衡不同诉求，维护网络秩序，通过理性协商解决虚拟社会治理问题。实现网络治理模式向多主体协同机制转型，一方面需要政府在管制与自治之间找到恰当的职能定位，营造一个承认、保护和促进虚拟社会发展的环境；另一方面需要网络企业、网民群体、网络组织有一个相对充分的个性化发展，达到能够自律、接受他律、勇于互律的应有境界。

4、从侧重司法解释转为推进网络部门法建设。在应对网络热点难点问题，司法解释确实起到了弥补网络法律缺位的良好功效，如关于网络谣言的认定与处罚等。但是，通过司法解释将现实法律应用到虚拟社会的做法，不宜作为网络法制建设的常态手段。应对网络法律滞后的根本举措是，确定网络社会的主要调整对象及调整方法，做好网络法律体系的顶层设计和立法规划，尽快形成互联网部门法，以增强依法治网的力度、精度、信度。

5、完善网络治理的法律救济体系。在网络治理实践中，一个完善的法律救济体系，不仅能保护网络空间中的权利，也提供以权利限制权力的可能。目前，我国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多为禁止性条例，既限制了

网络信息流动，也未能向网络服务商和网民提供相应救济保障。为此，需要抓紧完善关于网络治理的法律救济体系。通过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的公开意见表达与多元共同协商，形成关于治网共识与治理决策的社会参与机制。

### 网络社会治理的政府对策

史斌：面对当前网络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各级政府部门需要努力创新在网络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1、切实转变网络治理理念。各级政府官员要正确认识网络社会发展的新规律和新特点，努力消除“网络恐惧症”，对于网络社会治理，要切实转变治理理念，既不能粗暴“封”“删”，只堵不疏，导致民意渠道堵塞；也不能放任自流，任其发展，致使网络民意被操控被利用。各级政府部门要强化作为网络社会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在问题和危机面前不回避、不推诿、不失语，以积极诚恳、开明开放的心态直面网民民意，化解网络危机。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多中心治理的理念，推动政府部门、网络信息供应商、社会组织、网民等多元主体通过平等的协商、谈判与合作解决网络社会中存在的各类矛盾与纠纷，努力推进网络社会自治。

2、不断创新网络治理模式。网络社会作为一种多中心、多节点、虚拟化的新型社会形态，治理对象和运作方式都要趋向复杂和多样，要不断创新治理模式，丰富治理手段。借助网络平台引导民众更加高效、便捷地参与社会治理。搭建起政府与大众快速沟通的各类网络治理平台，如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及时准确地向广大网民公布政府相关事务，让民众享有知情权，同时通过“网络问政”等方式了解民意，汇集民意，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整合网络社会中各个参与主体的力量，构建起权责明确、主体联动、资源共享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最大程度地增进社会共识，实现网络社会治理多元主体间的良性互动。

3、努力提升舆情处理能力。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与意见交互空前快捷，网络舆论的表达诉求也日益多元，要通过健全预警防范机制、健全预警防范机制、开展对网民心理和行为方式的研究，切实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及时监测、有效引导和积极处理。

4、着力加强网络法治建设。网络空间的公共性决定了网络社会不可能是法外之地。加强网络法治建设，也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障网民的表达自由，要逐步完善网络社会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加强网络执法队伍建设，扎实推进网络普法教育，推动网络社会和网络安全有序、健康发展。

### 社会组织在网络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郭春瑞：社会组织是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们为了实现共同意愿而自愿组成的群众性组织，作为公领域和私领域的一个中间地带，在社会治理中历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网络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

1、反映群众呼声、理性表达诉求。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社会分层化、分众化的现象日益明显，且各自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组织作为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在日常及重大事件中，充分利用相关领域的专业力

量，加强与公众沟通，理性表达群众诉求，从而来影响和引导网络舆论，可以缓解政府在网络社会治理中所面临的压力。

2、传递公共服务、普及专业知识。社会组织的力量，来自于它的专业知识和；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则来源于组织的自律和诚信，以及运行过程的透明化。社会组织要主动做好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所具有的巨大传递能力，利用自身特长和专业背景，合理进行议程设置，普及科学知识，服务社会公众。

3、利用网络平台、提升组织活力。在我国，较长时期内是国家通过行政体系以及作为其延伸的企事业单位承担着各种公共服务的角色。但随着社会治理思路的变化和公共服务需求日趋多样化和精细化，政府也逐渐在改变角色，由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向公共资源协调者的角色转变。社会组织以其专业性、志愿性、公开性、非营利性等特点，成为帮助政府承担部分公共服务职能的适宜主体。要积极探索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模式，规范政府、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供给中的职责，充分扩大社会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运作空间，大力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提升社会组织活动能力。

### 着力培育网民自律精神

徐艳蕊：当今社会对网络的依赖度在不断增强。基数庞大的网民群体和活跃的用户使用，使得网络社会治理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工作。除了政府监管、社会组织协助外，引导网民加强自律和自我管理，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1、注重引导网络社群建立健康有序的运作机制。网民并非单一、孤立的个体，往往会因为自身的基本情况和对网络的使用偏好，而形成各种不同形式的网络社群。这些社群会通过各种即时通讯工具、社交网站、公共论坛等建立联系、交流观点和表达情感，甚至发展线下活动，基于共同的喜爱和偏好发展出共享的价值观，使这些社群较为强烈的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在网络社会治理中，如果能够使网民的严谨自律与社群归属感紧密连接起来，使网络社群自觉追求健康、有序的发展形式，从内到外培育网络使用者自尊、自爱、自觉的规范性行为习惯，会在降低网络社会治理成本、深化网络社会治理效果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2、发挥网络社群中意见领袖的积极示范效应。如何使自律性成为网络社群归属感、认同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见领袖的示范和引导作用非常重要。目前在网络治理中一提到意见领袖往往就联想到微博大V，但对许多深度依赖网络的社群而言，微博并不一定是他们主要的活动空间和平台。比如旅游爱好者更依赖BBS论坛、体育迷和明星粉丝社群更依赖贴吧，音乐、影视作品的爱好者更喜欢豆瓣。每一个不同的社群都在发展中培育出了自己的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在社群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力。如果这些不同社群的意见领袖，能够自觉以严谨自律的形象参与社群活动，会对普通网民的网络活动起到良好示范和引导效果。

3、利用网络空间的不同区块为普通网民开辟发表观点和感情表达的多重渠道。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多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升级，网络作为交流平台的平台功能变得更加重要。在近年网络舆论事件的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到，在网民身上普遍存在着强烈的发表观点和感情表达的需求。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需求，是网络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课题。严格抑制并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利用网络空间的层理性，为普通网民开拓多样化的表达渠道，可以有效地缓解交流需求和管理需求之间的张力。比如体育迷群体中的足球、篮球和网络球评社群，在社群成员的意见及情感表达中，往往含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微博及豆瓣上的心理学小组，经常利用专业知识对各种社会心理问题进行分析解读和疏导。对这些网络社群进行适度鼓励，不仅能够拓宽网民网络交流和表达的渠道，而且还能够培育出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气氛。

## 观点聚焦

### 大运河遗产保护任重道远

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专家学者表示，申遗成功只是第一步，后申遗时代对大运河遗产的保护任重道远。

#### 大运河的价值无可比拟

如果说绵延万里的长城是中华民族挺立不屈的脊梁，那么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则是民族流动不息的血脉。大运河申遗项目始于2006年12月，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及浙东运河沿线8个省市27个城市的58个遗产点，河道总长1011公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大运河的作用不可替代，大运河是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遗产。在古代，大运河是国家的生命线，它将我国因自然地理形成的东西向的多条水路，通过人工开凿，进行南北向沟通，展现了中国古代极高的科学技术水平，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程。如今交通方式虽然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大运河仍然保持着强大活力，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运河遗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新拓展，目前，已有5项国外运河及其相关的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包括法国米迪运河、比利时中央运河的四条吊桥、加拿大多里运河、英国亨特斯沃泰水道桥与运河和荷兰阿姆斯特丹17世纪运河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安瑞认为，这些运河都是工业革命之后开凿的运河，历史仅有二三百余年，无论从时空跨度、历史价值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科技含量上相比，它们与中国大运河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在世界运河史上，中国大运河的开凿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工程技术成就最高，流域面积最广，从初创至今的两千余年间一直在发挥重大运输功能。

#### 申遗过程促进了大运河保护

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相比结果，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才是最宝贵的。通过申遗，使遗产相关的国家、地区、部门、遗产点等各方面能够更好地树立起遗产保护的意识，共同应对遗产保护及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把遗产保护做得更好。大运河申遗启动至今已近8年，与2006年相比，大运河部分地区出现的断流、淤塞、污染的现象已得到很大改进，清理、整顿、修复、疏通等一系列繁杂而艰巨的工作使大运河再现生机。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光亚表示，保护是申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大运河申遗与保护的关系，申遗只是一种推动保护的方式，保护好大运河遗产，揭示和展示大运河遗产所蕴含的杰出的普遍价值以及深层次的中国文化特色，并将之传承后代，这是申遗的基本宗旨。申遗工作的全面推进客观上促进了大运河的保护工作。申遗过程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人们逐步摸清了大运河遗产的资源状况、河道变迁、研究资料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等基本信息，编制了较为系统的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国际层面的比较研究也得到深化，大运河遗产“杰出的普遍价值”得到了梳理和升华。

#### 建立“活态遗产”保护体系

大运河遗产是仍在使用的活态线性文化遗产，申遗结果落实，大运河遗产保护随之进入“后申遗时代”。如何实现保护和开发的动态平衡，探索建立“活态遗产”保护体系，任重而道远。

刘庆柱指出，申遗本身是国家行为，申遗前后的管理也是国家行为，但是国家很难包管全部，各地作为国家的一级政府，必须具有宏观视野，在运河保护中实现综合协同。应充分意识到地方行为是国家行为的组成部分，处理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严格按照既定规划行事，在保护好的前提下科学利用。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传播与公众参与委员会专家委员齐欣认为，大运河申遗促进了“社会化保护”的发生发展，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社会化的进程。保护不可能只靠政府，一定要有社会力量尤其是群体组织的加入，最终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的综合体系，全社会参与的活态保护是最好的保护。

保护和开发如何实现动态平衡是关键，也是难点。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表示，与以往的文化遗产不同，大运河是“活着的”遗产，并且正在发展着。因此，应当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探索建立一套新的保护体系，不能仅仅划个地设静止地保护。

(李伦)

## 理论漫谈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下午就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进行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时强调，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

领导干部何以要立身？这是因为领导干部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和单位的领导者、组织者、协调者，其立身如何，关乎其领导的向心力、组织的凝聚力、协调的影响力，关乎其在引导好、保护好、发展好广大干部和

### 领导干部靠什么立身

赵畅

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上的可持续性，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的立身，既然如此重要，那么，领导干部靠什么立身呢？换言之，怎样立身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发挥上述作用呢？习近平总书记无疑给出了一个最为完整、最为生动的答案，那就是要“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信念是立身之基，人格是立身之魂，实干是立身之要，三者缺一不可、辩证统一，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和手段。

信念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信念是目标，有了目标，就不会迷失方向；信念是动力，有了动力，就不会停滞不前；信念是激赏，有了激赏，就会智慧无穷。坚持以信念立身，关键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一个有着坚定理想信念的领导干部，必然会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自觉地把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融入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之中。

人格，更多是指领导干部个人的道德品质。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不是喊出来的，不是包装出来的，而是靠脚踏实地干出来的，尤其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靠台上说与台下做起来合起来的，靠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聚集起来的。具有人格魅力的领导干部，因其言有号召力其行有带动力其德有感染力，故而总能事半功倍，干好事、干成事。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喊出来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不是包装出来的。靠的是真抓实干，靠的是富厉风行，靠的是狠抓落实。坚持实干，关键是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抓工作，说了算，定了干，一步一个脚印，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坚持实干，关键是要敢于担当、勇于创新，苦干巧干、善作善成。

当前，国际形势波云诡谲，国内发展攻坚克难，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尤其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团结和带领广大干部在群众理直气壮地大闹天宫地开展工作中，在推进改革中续写中国辉煌，在深化改革中托起中国梦。

# 宁波历史上的五条“海上之路”

陈依元

## 实践与思考

2013年堪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谋划和规划之年，2014年则是宁波被列为“进一步对外开放沿海城市”30周年、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界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重要指示30周年。回望宁波海洋开放史及其对宁波经济文化的多元影响，可以看到宁波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具有的厚重历史积淀。

“海上丝绸之路”原泛指古代东西方之间借助海洋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是开放之路，也是历史上宁波区域开放的代名词。它使宁波从史前时代的海洋文明进入以东西方文明对话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文明时代。它不但是商贸往来之路，也是文化交往之路；不但交流物质文明，还交流精神文明；从广义上说，其内涵不限于商贸往来，还包括文化(如科技、人文)尤其是书画、佛教文化)的交流，实际上包含五条“海上之路”——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狭义)。海上丝路一是对宁波纺织

文化有深远影响；丝织品及其他纺织品是海上丝路上交流的商贸载体，同时又构成了纺织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历史上浙东地区发达的蚕桑文化与纺织文化，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准备了前提条件；而它的长期繁盛，也让宁波接受了外来纺织文化的影响，有利于学习外国织造技术，提升纺织品质量。二是对宁波服装文化有广泛影响；它刺激了浙东一带蚕桑业与纺织业的发展，经这条海路向宁波波去了来自各国的各色织物、布料，也为宁波服装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近代以来欧风东渐，西方的服装样式特别是西服经由海路先在上海登陆，后影响宁波，产生了“红装裁缝”。

——有一条“海上陶瓷之路”。浙东是中国瓷器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商周时期，这里就成功地烧制出原始瓷。有关考古资料表明，至少在魏晋时代，越窑青瓷就外传到了朝鲜半岛，在亚洲、非洲及欧洲20多个国家地区中，都留有越窑青瓷的历史足迹。各国正是从陶瓷中认识中国，从越窑青瓷中认识明州(宁波)的。与此同时，外国人开始仿造青瓷。各国人民热爱越窑青瓷的风气及越窑瓷器的高昂身价，反过来推动、刺激了浙东制瓷业的进一步繁荣与制瓷技术水

平的提升。——有一条“海上书画之路”。“沙漠，骆驼，西方，夕阳西下，背负的是鲜艳的丝绸，这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大海，船队，东方，旭日东升，运载的是飘香的书卷，这是古代的书籍之路”。丝绸之路交流的丝绸等物品，其物质形态如今大多已湮灭；而书画之路交流的书画，凝聚着中华文化创意，超越时空、惠及后代。如汉字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就是如此。中日间经古代宁波进行了长期、大规模的书籍交流，这对宁波的藏书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宁波历代的私人藏书家不仅收集了佚失在外的中国典籍，还保存了不少由国外特别是日本翻刻的中国书籍和外国人的著作，丰富了藏书。自唐代至明代，中日间借助海上通道还有不少绘画艺术交流。明州的浙派山水画及明州画风对日本绘画艺术构成很大影响，反过来也促进了明州绘画特别是佛教绘画艺术的发展。日僧雪舟等扬的画作既为日本绘画注入新的元素，也丰富了浙东的山水画面内涵，并以画作的形式保存了宁波几百年前的珍贵原貌。同时，中日间经宁波还有许多书法作品交流。朱舜水是传授中国书法到日本的最得力者。这种交流活动也促进了浙

东的书法艺术的发展与繁荣，使这里成为中国书法的滥觞之地。

——有一条“海上茶叶之路”。正如京剧被称为国剧、丝竹被称为国乐一样，饮茶被称为“国饮”，它们都是中国货物的国粹。海路不仅把茶叶作为大宗货物加以交流，把中国茶叶出口到国外去，而且还交流茶道。借助于这条海路对外的茶文化影响，反过来促进、推动了浙东地区茶叶种植的技术、品种及饮茶法的改进，促进了宁波茶文化的兴盛。

——有一条“海上佛教之路”。“白马东来”。佛教是在两汉之际通过古丝绸之路，经西域诸国传入中国的。没有古代的陆上开放，就没有佛教文化的传入中国；而没有海路的开放，也就没有佛教文化的传入宁波。“紫气东渡”。宁波还因本地及周围佛教寺庙众多(如阿育王寺、天童寺及周边的天台山清静与普陀山等)，以及海路交通的方便，成为佛教文化东传日本与朝鲜半岛的中转地之一。浙东与日、韩之间历史上长期的佛教文化交流，为近现代以后中国与这一地区的佛教文化友好交往、特别是许多日韩信徒频繁到浙东参拜祖庭打下了历史基础。

(作者为宁波大学教授)